

“非典”前后城镇居民的体育行为

何敏学, 都晓娟, 宋 强

(辽宁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对“非典”前后城镇居民体育行为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非典”前后城镇居民体育行为变化主要有4种类型:终身型、继发终身型、波动型、游离型,具有明显的职业特征、年龄特征、学历特征和性别特征。

关 键 词:非典;城镇居民;体育行为

中图分类号:G80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6)06-0033-03

The sports behaviors of urban residents before and after SARS

HE Min-xue, DU Xiao-juan, SONG Qia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surveyed and analyzed the sports behaviors of urban residents before and after SAR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re are 4 typical types of change of the sports behaviors of urban residents before and after SARS, namely lifetime type, consequential lifetime type, wavy type and dissociative type; the change of the sports behaviors of urban residents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occupation, age, educational level and gender.

Key words: SARS; urban resident; sports behavior

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作为社会环境的“非常规事件”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比“常规事件”要大得多^[1]。“非典”是人类社会经历的空前劫难,面对“非典”对生命和健康的威胁,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健身行列中去。“非典”对人们体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人们的健身活动从来没有像“非典”期间那样普及、那样自觉。但“非典”过后,有许多人又疏远了体育,对健身不在意。本课题对“非典”前后城镇居民体育行为的变化进行研究,揭示类似“非典”这样的关乎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非常规事件”对人们体育行为的影响。

我们将“非典”前后城镇居民体育行为的变化进行代表性的划分,按4种体育行为类型(A:非典前后都参加体育活动;B:非典前不参加,非典期间、后参加;C:非典前不参加,非典期间参加,非典后不参加;D:非典前后均不参加),编制4套问卷,自2004年12月至2005年7月,对北京、上海、广东等9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在调查中,让被调查者依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填写不同的问卷表。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563份。调查对象年龄18~86岁,平均35.27岁;覆盖15个行(职)业;其中女2236人,男2300人。使用SPSS11.0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处理。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非典”前后城镇居民体育行为变化的一般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A、B、C、D4种体育行为类型的城镇居民分别为1477人(32.60%),907人(20.0%),1007人(22.2%),1145人(25.2%)。

(1) A类型体育行为。

A类型体育行为的城镇居民“非典”前、中,至今都一直参加体育活动,坚持时间最长为60年,最短也有2年,平均10.34年。他们大多有固定的活动同伴和场所,具有一定的体育消费水平。可以断言,他们将终身享受体育。我们称A类型体育行为为“终身型”,这类体育行为的群体占调查样本的32.6%。

每一个人参加项体育活动往往是多种需要所驱使,但这些需要有主次之别,在心目中占主导地位的需要称为优势需要^[2]。“优势需要迁移”是A类群体“非典”期间体育行为变化的突出特点(见表1)。从表1中不难发现,A类群体“非典”期间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较之非典前产生了明显的迁移:健身需要和缓解压力的需要提升,而其他的需要均有所下降。因为人们对体育的需求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非典”使人们产生了严重的生存和健康危机,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所以“非典”期间A类群体健身和缓解压力的需求增大,相对而言,其他需求则降低。

表 1 “非典”前后 A 类群体参加体育活动目的 %

| 时间 | 消遣娱乐 | 交际交友 | 减肥健美 | 健身 | 缓解压力 | 提高成绩 |
|------|------|------|------|------|------|------|
| 非典前 | 19.6 | 3.6 | 9.1 | 55.2 | 8.7 | 3.9 |
| 非典期间 | 13.4 | 2.6 | 5.3 | 66.4 | 9.8 | 2.5 |

(2) B 类型体育行为。

B 类型体育行为的城镇居民“非典”前不参加体育活动,面对“非典”对健康和生命的威胁,他们投入到健身行列中来。“非典”期间体育健身的良好体验(35.4%)和个人意志努力(22.9%),加之环境的影响(家庭、社区、单位等),使他们“非典”过后一直坚持参加体育锻炼,继续保持积极的体育行为。相对于 A 类型体育行为,我们称 B 类型为“继发终身型”。这一群体占调查样本的 20.0%。

(3) C 类型体育行为。

C 类人群的体育行为表现为“波动型”。“非典”前不参加体育活动,受“非典”的影响,期间曾有过积极的体育行为,“非典”过后又疏远了体育。个中既有主观原因(缺乏意志努力占 34%),也有客观原因(没有时间占 25.3%,媒体宣传、单位重视、物质条件等占 37.5%)。C 类人群被卢元镇^[3]称为“被动体育人口”,“是出于某种社会压力被迫进入或在特定环境下被卷入体育中来的参加者。被动体育人口在社会压力和特定环境消失的时候,就很有可能退出体育人口”。看来,激发他们的体育参与欲望,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的体育环境氛围,使他们回归体育,是我们的艰巨任务。这类群体

占调查样本的 22.2%。

(4) D 类型体育行为。

D 类人群“非典”前、中、后对体育的参与均表现为“零行为”。D 类群体虽“游离”于体育之外,但他们多数也表现出较为积极的体育观念(66.7%的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参加体育活动可以增强体质”)。D 类群体的这种较为积极的体育观念与游离于体育之外的消极体育行为的反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D 类群体变“游离”为参与之时,便是我国社会体育腾飞之日。持“游离型”体育行为的城镇居民占调查样本的 25.2%。

2 “非典”前后城镇居民体育行为变化的横向分析

在前面面对城镇居民“非典”前后体育行为变化进行了纵向分析之后,我们对城镇居民“非典”前后体育行为变化进行横向的分析。

(1) 职业特征。

社会学的研究表明,“职业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通过持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结合起来,……由于共同职业需要和长期的职业训练的结果,内群体成员也表现出与外群体成员所不同的某些行为和心理特征^[4]”。那么,城镇居民“非典”前后体育行为变化是否与职业有关联?有何规律?调查结果显示,不同职业群体中,A、B、C、D 4 种体育行为类型比例各不相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职业特点(见表 2)。

表 2 不同职业的城镇居民“非典”前后体育行为变化

| 类型 | 教师 | 学生 | 科研人员 | 医疗卫生 | 文化艺术 | 公务员 | 工人 | 农民 | 军人 | 个体劳动 | 企业管理 | 职员 | 无业人员 | 离退休 | 下岗人员 |
|----|------|------|------|------|------|------|------|------|------|------|------|------|------|------|------|
| A | 38.4 | 42.5 | 40.0 | 27.6 | 42.3 | 39.1 | 25.0 | 12.2 | 90.3 | 22.1 | 41.4 | 29.5 | 29.1 | 42.2 | 21.1 |
| B | 17.8 | 24.4 | 23.1 | 19.5 | 30.8 | 21.6 | 22.6 | 21.2 | 16.5 | 15.8 | 20.5 | 21.0 | 10.6 | 17.4 | 15.5 |
| C | 22.5 | 21.8 | 20.0 | 29.1 | 14.1 | 19.5 | 25.4 | 23.4 | 1.6 | 25.6 | 19.0 | 24.5 | 15.1 | 19.1 | 16.9 |
| D | 21.3 | 11.3 | 16.9 | 23.8 | 12.8 | 19.8 | 27.0 | 43.2 | 1.6 | 36.5 | 19.0 | 25.0 | 45.3 | 21.3 | 45.5 |

教师、学生、科研人员、文化艺术工作者、公务员、军人、企事业管理者、离退休人员,持 A 类体育行为的比例居高,均在 35.0% 以上;相反,持 D 类体育行为的比例相对较低。在上述群体中,体育行为的职业特点表现得最典型的是军人,持 A 类体育行为的比例高达 90.3%,因为身体训练是军事素质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

农民、个体经营者、下岗人员,持 D 类体育行为的比例居高,均在 40.0% 以上,而他们当中持 A 类体育行为的比例相对较低。农民、下岗人员等,与教师、科研人员、公务员等相比,可以说是弱势群体。一般来说,他们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体育健身知识较缺乏、健身意识不强,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环境、物质条件等,都差于教师、科研人员、公务员等。因此,关注这一弱势群体的体育,是非常必要的。

持 C 类体育行为的比例最高的是医疗卫生人员,接近 30.0%。医疗卫生人员“非典”期间体育行为变化最大,因为他们亲临抗击“非典”第一线,对生与死有深刻的理解。他们深谙体育运动对增进健康、抵御“非典”的积极作用,所以,他们是“非典”期间具有积极体育行为的群体之一。“非典”被

战胜的喜悦使他们放松了警惕,就又放弃了体育锻炼。

(2) 年龄特征。

我们将调查对象分为青年(18~30岁)、中年(31~55岁)、老年(>56岁)3 个年龄段,考察不同年龄群体在非典前后的体育行为特征(见表 3)。

表 3 不同年龄群体“非典”前后体育行为变化 %

| 年龄 | A | B | C | D |
|----|------|------|------|------|
| 青年 | 34.9 | 20.7 | 22.5 | 21.9 |
| 中年 | 29.3 | 20.3 | 23.0 | 27.4 |
| 老年 | 43.1 | 11.9 | 13.8 | 31.2 |

A 类体育行为的比例老年群体最高(43.1%),青年次之(34.9%),中年最低(29.3%);D 类体育行为的比例老年群体最高(31.2%),中年次之(27.4%),青年最低(21.9%);青年群体中 4 种类型的体育行为,以 A 类最高,老年群体中 A 类、D 类均较高。

青年人活泼好动,自然对体育亲和力强,精力旺盛、较少有家庭等方面的压力,所以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大(A、B 之

和达 56.0%)。但令人担忧的是,青年中还有 21.9% 为 D 类行为。

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使老年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活方式。社会的进步、物质与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使老有所养、老有所求,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在逐年提高。至于老年中 D 类比例也较高,可能由于年事过高(本课题调查中年龄最长者 86 岁),参加体育活动多有不便等所致。

本课题调查结果警示我们,与老年、青年相比,中年群体 A 类体育行为比例最低,并且有 50.0%(D 类与 C 类之和)的中年人不参加体育锻炼。中年群体是社会的中坚、家庭的主宰,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多种压力,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据王琪延对北京市 15~70 岁居民闲暇时间的调查,中年群体闲暇时间最少^[5]。所以,他们较少参加体育活动,不少中年人体力透支,甚至英年早逝。

(3) 学历特征。

社会学者认为,教育是“影响城市人行为与观念的主导性因素”^[4];文化程度较高的市民参与社区的频次平均超过其他受教育较少市民的 15%^[4]。教育程度与人们的体育参与行为有否关联?上海体育学院刘志民^[6]对参与体育锻炼的城镇居民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每周健身次数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文化程度越高,次数越多。那么,除了体育锻炼次数外,教育程度与体育行为的其他要素是否相关?特别是在“非典”这一关乎人们健康和生命的特殊时期,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对人们体育行为的多维变化有何影响?本课题研究发现,A 类和 B 类体育行为的比例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增大,特别是 A 类型表现得尤为明显;而 D 类型的比例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见表 4)。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居民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体育健身意识将更强,体育行为将更积极。

表 4 不同学历的城镇居民“非典”前后体育行为变化 %

| 文化程度 | A | B | C | D |
|------|------|------|------|------|
| 小学以下 | 20.8 | 14.5 | 16.8 | 48.0 |
| 初中 | 25.6 | 19.7 | 17.4 | 37.3 |
| 高中 | 29.5 | 19.4 | 23.4 | 27.8 |
| 大专 | 34.7 | 18.2 | 23.8 | 23.4 |
| 大本 | 37.8 | 24.6 | 23.4 | 14.2 |
| 研究生 | 44.3 | 18.3 | 20.7 | 16.7 |

(4) 性别特征。

在心理学中,“性角色”是指男人和女人一系列典型行为和特征。“性角色定型”则指对这些特征所持的一致意见。大量研究表明,在参加体育运动的人中,男性多于女性^[2]。我国体育人口中男性占 62.5%,女性占 37.5%^[7]。体育活动的这种性角色社会化和性角色定型使妇女参加体育活动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角色冲突。

本课题调查显示,A 类和 B 类体育行为的男性占 59.4%,女性占 45.5%;D 类体育行为的男性占 20.9%,女性占 29.7%。显然,无论是“非典”前还是“非典”后,男性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都大于女性(表 5)。

表 5 不同性别的城镇居民“非典”前后体育行为变化 %

| 性别 | A | B | C | D |
|----|------|------|------|------|
| 女 | 24.4 | 21.1 | 24.8 | 29.7 |
| 男 | 40.5 | 18.9 | 19.7 | 20.9 |

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在父系社会中,男人更看重体育,体育更青睐男人。古代奥运会是禁止妇女观看和参加比赛的。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观、价值观、伦理观的偏移遗留至今。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充斥着男尊女卑的思想,造成了妇女顺从、卑怯的社会心理。这些传统的观念直到今天还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我国妇女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无疑会反映在妇女对体育的认识,特别是对体育的参与上。

社会学的研究认为,人类性别的社会分层存在着性别刻板现象。性别刻板现象是指传统的、被广泛接受的对两性的生物属性、心理特质和角色行为较为固定的看法、期望和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中,性别刻板现象表现为:在身体特征上,通常认为男性高大,女性纤弱;在心理特质上,男性刚强、自立,女性温柔、依赖;在角色行为上,男性适合于社会工作,女性适合于家务劳动^[4]。在现实社会中,不仅性别刻板现象不同程度地影响女性参与体育,并且多数女性家务和工作“双肩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她们参与体育活动。

本课题研究结果再次提醒我们,重视妇女体育,创造条件、动员劳动妇女参与体育活动,是开创我国群众体育新局面的重要措施。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体育的不断发展,这种性角色的社会定型会随之发生改变,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角色冲突和性别刻板现象也会逐渐减弱直至消除,妇女体育一定会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 [1] 徐懋.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7-8.
- [2] 刘一民. 体育行为学[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3: 79, 37.
- [3] 课题组.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R].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8: 64-65.
- [4] 闵学勤. 城市人的理性化与现代化——一项关于城市人行为与观念变迁的实证比较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74-176, 148.
- [5] 张景安. 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151.
- [6] 刘志民. 小城镇体育大社会问题[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131.
- [7] 课题组.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R].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5: 26.